

商业与联盟

贸易如何影响国内政治联盟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RONALD ROGOWSKI

[美] 罗纳德·罗戈夫斯基 著

杨毅 译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商业与联盟

贸易如何影响国内政治联盟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RONALD ROGOWSKI

[美] 罗纳德·罗戈夫斯基 著

杨毅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商业与联盟:贸易如何影响国内政治联盟/(美)
罗戈夫斯基(Rogowski, R.)著;杨毅译.—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2012

(东方编译所译丛)

书名原文: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ISBN 978-7-208-10612-3

I. ①商… II. ①罗… ②杨… III. ①贸易经济-影
响-政治 IV. ①F710②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7565 号

责任编辑 王子夔
封面装帧 王小阳

商业与联盟

——贸易如何影响国内政治联盟

[美] 罗纳德·罗戈夫斯基 著

杨毅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5.75 插页 4 字数 225,000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0612-3/F·2097

定价 36.00 元

献给我的父母，
林达尔和伊奥拉·罗戈夫斯基

有效的概括，犹如一幅飞行员用以穿越大陆的大比例地形图，对于某些目的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正如更精确的地图之于其他目的必不可少一样。人们在初步寻找地理方位时，并不需要确切了解每座房屋和每条小路的位置。而专家们栖居在茫茫森林般的史料中彼此争辩，在这里一位探索者在很长一段时间会有迷惑感，没有一番挫折，他很难从这种境遇中摆脱出来。假使他根据自己的游历绘制了一幅地图，一位本地居民便会振振有辞地指责他忽略了自己的小屋和空地。遗憾的是，这位探索者确曾在那个地方发现过许多食物和饮料。倘若在旅程终点，这位探险者试图为初来者简要地讲解一番他所目睹的奇闻轶事，批评之声很可能会接踵而至。¹

小巴林顿·摩尔
《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

注 释

1. 译文参考了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张东东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前言第3—4页。

中文版序言

在《商业与联盟》出版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后，欣闻它的中文版即将问世，我很荣幸能够受邀为中文版撰写这篇简短的序言。借此机会，我想与中国读者共同探讨两方面的问题：(1)这部著作当时的分析框架对于中国有什么样的意义(也就是说，它对其他劳动力充裕、资本稀缺的国家有怎样的价值)；(2)这一理论如何能够更好地适应环境的变化，不断增强自身的解释力。

对中国而言，在我看来这个国家向世界经济开放是能够支持我的基本论断的。那么什么样的政治联盟会支持邓小平的开放政策，而谁又在抵制和对抗它呢？普通的工人和农民很明显就是受益者，他们中有上百万人因为获得了生产世界需要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机会而摆脱了贫困。正如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教授所指出的，收益毫无疑问流向了中国和“外国”(实际上经常是海外华人)的投资者，这些人能够提供在中国曾经非常稀缺的资本。不仅如此，中国政府也是受益者，因为可观的经济增长(其宏观经济政策与货币政策经常比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大国的政策更为明智)，也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形象。

而谁又是开放的受害者呢？显然是中国农业生产中的一些部门，它们由于从土地更加充裕的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进口而导致产品价格下降，从而不得不放弃或重新安排它们的生产。美国农业部最近概括了中国农业部门的处境：

中国的农产品贸易模式也是符合它的比较优势的：它们希望进

口土地密集型产品(大豆、棉花、大麦、橡胶、大豆油以及棕榈仁),同时出口劳动密集型的商品(鱼类、水果、蔬菜以及加工农产品)。

而开放的另一类受害者就是国内那些稀缺资本的“所有者”。这种说法虽然有点草率,但在改革开放之前,这类人主要是企业中的行政管理者,(在从东欧到印度绝大多数中央计划经济体中)他们热爱的是他们所具有的行政权力。最后,至少在改革初期,另一类稀缺的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受过教育的精英们——在与技术充裕的经济体的交往中时常遭受失败的打击。

在中国,向世界经济开放同样也缔造了一些奇迹。开放政策的受益者能够战胜强大的受损者团体所形成的反对立场。其中的领导力量,毫无疑问,就是有远见的国家和执政党的精英们,他们将注意力自然地集中于建设一个富强国家的目标上;而且不同于他们的苏联同仁,这批人具有实现这一目标所必需的宏观经济知识和专业技术技能。

在展望未来的同时,我们也应考虑到那些破坏性事物所具有的风险。《商业与联盟》的分析框架使我们能够预见中国社会在未来所面临的紧张状态。同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国仍然是资本和土地较为稀缺,而劳动力资源充裕的国家,其中人力资本(高技术劳动力)的充裕程度在增加。如果针对开放的反对意见(像印度那样)涌现出来的话,它将主要出自乡村(特别是如果全球经济低迷使得大量的城市流动人口重返农村时)以及那些小型企业,特别是零售部门中。它们惧怕同那些规模巨大、效率高、通常还具有国际支持的企业进行竞争。

在急速转型的全球经济中,如果重新考察本书的分析框架所具有的更广泛的适用性的话,我是不那么有信心的。正如奎因(Quinn)和弗里曼(Freeman)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所观察到的那样,新型金融工具的广泛使

* 罗戈夫斯基提到的这篇文章是由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约翰·弗里曼(John R. Freeman)和乔治城大学丹尼斯·奎因(Dennis P. Quinn)撰写的一篇论文,题目为《重新思考民主的经济根源》(The Economic Origins of Democracy Reconsidered),这篇文章最早于2008年在耶鲁大学和乔治城大学举办的美国政治学会的会议上宣读,此后这篇论文经过修改后又于2009年11月提交德州农工大学举办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会。参见 John R. Freeman and Dennis P. Quinn, "The Economic Origins of Democracy Reconsidered", <http://www.rhsmith.umd.edu/seminars/pdfs/2010/FreemanQuinn.pdf>。——译者注

用能够使那些资金相当宽裕的投资者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投资：阿根廷的地主可以在国际市场上将他们的土地转化为证券资产，同时购买世界上任何地区、任何领域的企业（包括中国的企业）的股份。可以想象，中国和印度的财富新贵们同样也可以实现这种金融资产的多样化。因此，要详细区分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其困难程度也在逐渐增加。同时，经济上的分流引起政治上的分歧（例如，人力资本专业化的知识或发明创造力是不能直接转化为债券或被出售的，因此这一在世界各地都在兴起的要素获得回报也就不足为奇了，而那些妨碍发展的愚昧政府最终刺激了他们国内掌握高技术的这批人——他们在“阿拉伯之春”中不是少数——的暴力反抗也是很正常的了）。

正像这一事例所表明的那样，《商业与联盟》同样也完全忽略了区位上的外部性以及规模经济问题。例如，一位具有极高资质的投资经理人在尼日利亚（尽管尼日利亚缺乏他所具有的技术）与在英国或美国（除非或确实是因为纽约或伦敦这一要素是充裕的）相比，是不会获得较好的收益的。中国的经验同样也说明，在相关部门中，天资这一因素只有在具有同等天资的人聚在一起时才能发挥作用并收获回报。像我一直以来那样，住在好莱坞附近，我本来能够发现这一明显的事实，但是我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种情况通常就被视为区位优势的一种表现。一方面是因为在一些部门中移民比贸易发挥的作用还重要（无法流动到关键节点中的人力资本是不能带来财富的）；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包含创造这些关键环节的）“产业政策”表现得更为合理。

更让人感到深深不安的事情在于，最近出现的金融领域的变革成为世界各国社会内部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的先兆。穷人缺乏知识以及改变现状的资源，他们只能求助于自身所具备的体力劳动；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又不能随意移民到那些法律能够保障他们获得更好补偿的地方。实际上，排外情绪开始成为许多发达国家政治的主流。包括欧洲和美国，都在阻止更多的移民进入。在这样的国家，采取一些相对克制的方式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他们应对全球经济的波动（这些波动包括商品价格或房价的暴涨暴跌、汇率市场的剧烈震荡等）；而对于穷人而言，无论他们生活在什么地方，则难以幸免。因此，2008年出现的经济大萧条不同

于先前的经济低迷¹，它进一步加大而不是缩小了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距（后者有时候还包括新近出现的穷人，例如，许多美国房产主。他们本可以轻易地改变自身的处境，但是却极不情愿舍弃这“一篮子中的所有鸡蛋”）。

通过这样的分析，我推测这一令人沮丧的全球发展状况对中国的影响不亚于其他国家。那些通过经济改革获得了可观财富的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会足够明智地让他们所持有的股份与财富实现多样化；而那些最贫穷的人则不会这样做。他们也因此成为全球经济波动最大的受害者。按照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这也是《商业与联盟》的理论基础）的推断，在像中国这样劳动力充裕的社会，经济开放会缩小经济上的不平等，而实际上全球金融领域新近出现的变化则成为各个国家内部贫富差距增大的先兆。一些发达国家（最典型的就是瑞典）的开明的政府给出的解决办法就是鼓励（或要求）国内贫困的工人购买一系列国有投资基金，并通过政府开支的方式向他们提供进行投资和实现资产多样化的专门知识，这些是通过其他方式难以获得的。我们可以设想在储蓄率极高的中国，在那些低收入的工人中大范围地推广这种投资基金，也许是一种相当有利的变革，而且会受到欢迎。

但是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包括美国政府在内，并不是如此地明智。因此在绝大多数国家，社会中的贫富差距在扩大。这是《商业与联盟》一书中并没有包含的内容，因此该书在解释力上也受到了质疑。但是现在我认为这样的情况确实存在。不过我希望我是错的，而且我更希望的是中国的读者能够帮助我证明这一点。因此衷心希望听到中国读者对该书的反馈与批评意见。

罗纳德·罗戈夫斯基

2011年12月19日

注 释

1. 以前，富人的绝大多数收入是通过投资获得的，因此股票市场的崩溃对他们收入造成的影响要远大于低收入工人失业所遭受的损失。投资的多样化意味着至少在发达国家，富人是能够“阻隔”经济低迷所造成的冲击的，因此在某一专门的股票市场或一系列股市的震荡中他们所遭受的财产损失是有限的。

前言与致谢

我们已经从比较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杰出的研究中熟悉了这些故事。¹在19世纪60年代,美国因奴隶制和关税问题而分裂:西部的农民联合北部的工人和企业主一起反对南方的种植园主。10年后,德国政治也因贸易保护和议会制度问题而处于分歧中,但该国的情况是企业主、容克贵族和小农联合起来对付工人。而在19世纪90年代的平民主义的抗议中,美国政治重新进行了“分化组合”:西部和南部激进的农民激起了城市工人和企业主的联合反对,确保了共和党独霸美国政坛多年,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为止。在大萧条期间,瑞典和挪威的农民和工人形成了“红—绿”联盟,反对城市精英。而危机在拉丁美洲蔓延之际,城市工人、企业主和中产阶级组成了民粹主义联盟,削弱了传统地主阶层的统治。“二战”之后,农民革命在亚洲和加勒比地区、中美洲一些国家风起云涌:佃农与农业劳动者通常在城市知识分子的领导之下,同农村和城市的精英进行斗争。

如果说这些各式各样戏剧性的事件中相关各方对事态的命名尚且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各事件中各方力量的联合或冲突则全然不同。每一种可能的排列实际上都是在某一关键历史时刻发生的;当然任何情况都不可能事先排除在外。而且,正如我所要阐释的那样,类似的分歧与联盟并不只是我们这个时代才出现的;在16世纪的欧洲或者古希腊都有类似情况发生。

自然地,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者们一直试图解释这种令人困惑的组合:

解释为什么国家会出现政治上的分裂,为什么分裂会发生变化。文化与宗教分歧、封建传统势力、迅速的工业化或选举权的普及、现代化“危机”的后果、制度设置、外国威胁或侵略的影响,以及新近最时髦的“生产周期”说等因素²都在不同程度上给予了解释。

我并不打算否认这些变量的重要性。实际上,在本书接下来的章节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抛开这些变量就无法给出有力的解释。但我仍然认为,如果我们承认直到现在还有相关的因素被普遍忽视的话,我们可能会对这一问题作出更详尽的解释。也就是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间,在面对国际贸易问题时,因为不同的资源禀赋,会自外部引发一种变革。

实际上,一些国别研究,甚至许多比较研究都认为在一定环境下,国内政治是会受到国际贸易变革的影响的:罗森堡(Rosenberg, 1943),格申克龙(Gerschenkron, 1943)以及最近的古雷维奇(Gourevitch, 1977; and 1986 chap. 3)都分析了廉价的进口商品,特别是食品是如何影响1873年之后欧洲国家内政分裂和联盟的。森克尔(Sunkel)与帕斯(Paz, 1973)、卡多佐(Cardoso)和法莱托(Faletto, 1979)以及其他“依附论”者都指出贸易模式和流动的变化是拉美动荡不安,分化和联盟的主要因素之一。卡梅伦(Cameron, 1978)认为左翼力量的强弱和公共部门增长率的高低会受到一个国家国际贸易开放程度的影响。亚伯拉罕(Abraham, 1981)曾试图将魏玛德国的冲突与不断波动的出口市场部分联系起来。而最具挑战性的是沃勒斯坦(Wallerstein, 1974 and 1980)所主张的:政治制度中的地区性变量以及现代世界初期的分裂可以通过世界市场的崛起以及市场中的劳动分工加以解释。

我在本书中的主张则更具有普遍性。简而言之,我试图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结论作出解释——包括我们熟知的斯托尔帕-萨缪尔森模型(Stolper-Samuelson theorem, 1941)——表明开展国际贸易的成本增减和开展国际贸易的难易程度会对国内政治的分裂造成截然不同但都强有力的影响;而且可以预见的是,这类现象将在要素禀赋截然不同的国家中出现。我认为它所表明的含义与我们所观察到的分裂的模式出奇地一致。而在贸易影响下全球变革的五个时期中,许多国家出现了这类模式的变革。

第一章概括并界定了贸易与政治分裂之间的理论联系。第二、三、四章则运用这一理论框架,对最近三个时期出现的变革加以分析,它们是19世纪世界贸易的大扩张、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出现的大衰退,以及1945年“二战”后贸易的复苏与扩张。在第五章中,我运用三个与目前政治学研究视角不同的关于贸易变革的事例试图说明这一理论的适用性,这三个事例是:古希腊和早期欧洲“漫长的”16世纪所出现的贸易扩张,以及对于罗马帝国衰落至关重要的远距离贸易的衰落。第六章进一步指明了未来研究的方式和方法,这里采用的研究路径也许能够给比较政治研究的其他领域带来启示。

尽管我为了支持我的理论举出了各种事例,但这项研究仍然处于起始和探索阶段,它对每一专门案例的含义只具有建设性而不是决定性意义。很多工作有待我们继续进行。

• • •

在这本小书漫长的写作过程中,我受惠于多人的帮助,也深知亏欠大家,好在这里可以部分地予以弥补。首先最应该感谢的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星期二政治经济学午餐小组³的成员,通过他们,我首次接触并阅读了萨缪尔森和斯托尔帕的那篇文章;他们不断鼓励并为我打气,使我不断挖掘事物更深层次的政治含义。在这个小组成员中,我要专门感谢我的同事迈克尔·沃勒斯坦(Michael Wallerstein),他促使我将上述想法最终成书出版。

接下来,我要感谢位于加利福尼亚帕罗奥图(Palo Alto)的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CASBS),在1983年至1984年担任该中心的研究员期间,我对本书论述的内容有了初步的构想并取得了一定进展。与我同期的研究员中,罗格·诺尔(Roger Noll)在本书早期手稿的讨论(更多的是批评)中贡献颇多。给予同样帮助的还有来自斯坦福大学的诸位同事,他们是约翰·费内约翰(John Ferejohn)、朱迪斯·戈德斯坦(Judith Goldstein)以及史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

再有要感谢的就是我的妻子,凯瑟琳·罗戈夫斯基(Katherine Rog-

wski)。她不但在本书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承担了大量纷繁复杂的工作，而且是在1986年的圣诞节首次劝说我放弃原先更加分散的研究计划，全身心地投入这项研究中来。当我咨询我的好友乔尔·阿贝巴赫(Joel Aberbach)时，他也支持凯瑟琳的想法，建议我全身心投入，我也对其感激不尽。

史蒂芬·麦克米兰(Stephen McMillan)从1986年到现在一直是我的研究助手，他优秀而又勤勉，不但为我的著作查找参考资料，还对我早期的手稿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如果没有他的尽职尽责的工作，这本书不可能轻易完成。但如果他能够在手球比赛上偶尔让我赢他几次，那就是再好不过的了。戴维·鲁格(David D'Lugo)和迈克尔·凡·戴克(Michael Van Dyck)也为研究提供了其他帮助。而在本研究项目的后期加入工作的西莉亚·卡雷拉(Celia Carrera)是大多数学者做梦都难得到的极其出色的秘书。

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其他地方的许多同事都极其认真地阅读了本书草稿的部分章节，并提出了各自的批评意见，这对本书的修改极有价值，对我也是莫大支持。我要特别感谢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他阅读了每一稿(包括一些删节的内容)，而且不止一次在我沮丧时为我打气。我由衷地支持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Gosta Esping-Andersen)提名卡赞斯坦为“美国最豁达的学术大家”。⁴我同样要将罗伯特·贝茨(Robert Bates)、杰夫·弗里登(Jeff Frieden)和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归入像卡赞斯坦这样的人中。我的同事里克·鲍姆(Rick Baum)为本书的书名提出了建议，简简单单地胜过了之前令我犹豫不决的几个备选。我在这里专门提及表示感谢的还有詹姆斯·阿尔特(James Alt)、哈里·埃克斯坦(Harry Eckstein)、杰克·赫舒拉发(Jack Hirshleifer)、迈尔斯·凯勒(Miles Kahler)、詹姆斯·库尔斯(James Kurth)、戴维·莱克(David Lake)、戴维·莱廷(David Laitin)、爱德华·里默(Edward Leamer)、阿法·马尔索(Afaf Marsot)、詹姆斯·罗西瑙(James Rosenau)、塞缪尔·波普金(Samuel Popkin)、理查德·斯科拉(Richard Sklar)、阿曼达·蒂洛森(Amanda Tillotson)以及其他不知名的给予帮助的人士。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总编桑迪·撒切尔(Sandy Thatcher)不断地

鼓励我,并以超然的专业态度要求我,能在其中做到不偏不倚是件很难的事情。据我所知,他在各方面都以马克斯·珀金斯(Max Perkins)为榜样,但愿未来也有像A.斯各特·伯格(A. Scott Berg)这样的人能够记述他的经历。布赖恩·麦克唐纳(Brian R. MacDonald)作为本书的文字编辑,具有极强的专业技能和工作效率。受过古典学训练的他,在古代史方面为我纠正了(我们两个人都)难以计数的错误;而且,当我修正原有的错误需要重新强调传统的规则时,他毫不迟疑地给予了我必要的帮助,尤其是在那一部分中。

我在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研究工作部分受到国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BNS76-22943)对该机构的资助,本项目还一直受到加州大学学术咨议会洛杉矶分委会的研究委员会的财政支持。除此以外,我还要由衷感谢学校的教务长雷蒙德·奥巴赫(Raymond Orbach)、院长戴维·西尔斯(David Sears)以及系主任J.理查德·西森(J. Richard Sisson)批准我在1986年至1987年休学术假,使我能够最终完成该项研究计划。《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的编辑慷慨地准许我将早年发表在该刊上的论文重印作为本书的前言和第一章的一部分;我还要感谢美国政治学会的认可,我的这篇论文于1987年获得学会年会最佳发表论文富兰克林·L.伯德特-国家政治学荣誉社(Franklin L. Burdette-Pi Sigma Alpha)奖。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在1984年至1986年期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人会(CAP)的同事们。该机构庞大而独特,其推荐信是所有校内学术职务提升和终身教职评定的必需材料。在这个跨学科的团队里,我认识到杰出的研究是一致而美好的。我发现,只要仔细观察并稍受指导,你就可以像判断历史和政治学研究那样,即刻分辨出某项物理学或者微生物学研究孰优孰劣,这一标准无论是在莫斯科或新德里还是在纽黑文或洛杉矶都是一样的。这种相对宽广的视角,能够而且应该有助于我们评价和衡量自身的研究工作。

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妨碍过许多学者研究和写作的繁重的“管理”工作反而为我自身的研究提供了动力和帮助。我对此感激不尽,并为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而感到自豪。

注 释

1. 参见相关作品: Moore 1967, 第 3 章及第 7—9 章; Burnham 1970; Gahl 1966, 第 3 章及第 4 章; Huntington 1968。

2. 重点参考: Rokkan 1970, 1981; Lipset 1970, 1983; Moore 1967; Lipset and Rokkan 1967; Binder et al. 1971; Duverger 1959; Gahl 1966, 第 12 章; Johnson 1962; Skocpol 1979; 以及 Kurth 1979a, 1979b。

3. 没有什么机构比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建立的这个小组简洁而又灵活了。客观公正地看,它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为肥沃的知识土壤。1985—1986 年,当我开始构思我的观点时,这一小组成员包括(按字母顺序): Joel Aberbach, Richard Baum, Peter Bernholz, Leonard Binder, Jeff Frieden, Barbara Geddes, Jack Hirshleifer, David Lake, Karen Orren, Arthur Stein, 以及 Michael Wallerstein, Aberbach, Bernholz, 以及后来不再定期参加的 Orrn; 不过 James Denardo, David Dollar, Daniel Garst, Louis Goldberg, Miriam Golden, Mary Hampton, Douglas Rivers, Richard Rosecrance, Richard Sklar, Thomas Schwartz, George Tsebelis, John Wiley, 以及 David Wilson 加入到了这个圈子。

4. Esping-Andersen 1985, xvii.

目 录

中文版序言 / I

前言与致谢 / V

第一章 为何贸易的变化会影响政治分化 / 1

第二章 贸易的革命性扩展，1840—1914 年 / 21

第三章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与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贸易的衰落 / 66

第四章 贸易的重新扩张，1948 年至今 / 96

第五章 早期的贸易变革时代：古希腊、衰落中的
罗马帝国及 16 世纪的欧洲 / 143

第六章 本理论的适用性及其在社会科学研究上的
解释力 / 183

第七章 结论 / 198

附录 / 203

参考文献 / 204

译后记 / 230

第一章

为何贸易的变化会影响政治分化

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

1941年,沃尔夫冈·斯托尔帕(Wolfgang Stolper)和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最终成功地解决了困扰人们多时的因贸易保护(也可以理解为因自由贸易)而导致的收益与亏损的难题。¹他们指出,²任何一个社会,那些稀缺要素的所有者以及广泛使用稀缺要素的厂商会因贸易保护而获益(或者说因贸易自由化而受损)。³相反,社会中那些充裕要素的所有者以及广泛使用充裕要素的厂商会因贸易保护而受损(也就是说因贸易自由化而受益)。⁴因此,在一个劳动力资源充裕而资本贫瘠的社会,贸易保护将使资本家受益,使劳工受损;而贸易的自由化则会有益于劳工而损害资本家的利益。⁵

迄今为止,这一定理在关于关税政策的影响上虽然具有重要意义和广泛应用,⁶但其仅仅是一项陈述而已。然而,当人们意识到外国的变化恰好会产生诸如贸易保护所导致的增长或衰退这样的后果时,这一境况发生了改变。例如,运输成本的降低对于参与跨国贸易的国家关税的降低所产生的影响是难以辨别的;⁷那些降低了贸易风险或交易成本的国际机制的变化也是如此。反之亦然:在一个国家外部运输体系变得更加昂贵或者其贸易往来日益动荡的情况下,必然会产生关税提高的结果。

这一点不只为学术界关注,从历史上看,国际贸易的风险和成本都发